

抓、去管,这样才能有所成效。现在属于此类的无非人口超生、野蛮拆迁、群体上访、招商引资等。

基层政府要选择更加有效的治理工具

要取消使用“一票否决”制,让基层政府在治理中卓有成效,就须考虑改善治理条件和选择更加有效的治理工具。在整个公共治理中,基层治理得好坏,包括治理工具的选择,无不和上级政府给予的治理环境和条件有关。地方政府应当采取“减压多予”的策略。“减压”就是将传统的压力型行政转变为协商合作型行政。“多予”就是上级政府在给地方政府规定事权时,应当考虑财权和事权对等的原则。

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应当改变多年来粗放式治理的习惯,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逐步走上精细化、整体化治理的道路。要实现基层的优善治理,制度化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取代片面的、负激励的“一票否决”可以改作综合绩效评估。这种评估是以部门和个人的工作职责为依据,通过设计可操作的、符合实际行政过程的包含多种要素、不同权重的指标体系,全面、客观的衡量部门和个人的工作绩效。

(邓摘自《人民论坛》总351期 严强/文)

警惕南海问题的转向

南海的和平,绝非仅仅是中国美好愿望或两厢情愿就能办到。某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友好、合作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地在南海单边行动,并利诱区域外大国卷入,对中国逐步形成合围、夹击之势。随着美国的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最棘手、最头痛不已甚至是难以面对的挑战。

6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美国——越南政治、安全、国防对话上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安全,以及自由航行的权利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6月21日,美日两国政府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上,美日双方外长以及防长出席并联合发表声明,其中指出,要将“联手牵制中国”定位为两国最新的共同战略目标,并要求中国在南海停止对他国船只采取妨碍行为。在南海,正是美日等可能联手、联合行动的优先方向。这些仅只是美国的深度卷入的开始。

11月16日晚,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向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正式派驻美军,并将配备各式先进战机、战舰。有分析指出,这是美军自二战以来在澳洲的最大规模部署,将使美国获得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支点,同时美军也拥有了向中国南海投送兵力的前沿阵地。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1月16日访问马尼拉时,称南海为西菲律宾海,并向菲律宾承诺免费赠送第二艘海岸警备队快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印尼巴厘岛东亚峰会上菲美元首会晤时,称“彼此照应”安全。不顾中国大陆反对,奥巴马将敏感的南海主权争端搬到东亚高峰会上进行了“有力的讨论”。南海问题似乎成了美国重整亚太格局的支点,美国正步步围堵中国及卷入南海。与此同时,日本、印度、俄罗斯及澳大利亚亦加紧了跟随美国卷入南海的步伐。

中国现在正处于大国上升期。而从世界历史规律看,大国上升期通常是大国利益扩张期。中国向来爱好和平,反对扩张与侵略,但爱好和平不等于会失去维护领土及主权的勇气与决心。中国政府应在自己有能力、有实力的时候解决潜在问题与隐患,否则遗害无穷,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将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解决南海问题,中国需要更大的勇气与决心。如果不能应对周边国家的无理要求与挑战,遏制有关国家单方面破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行为,不能在地区内掌控主导权与话语权,中国的大国地位恐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必须且应该有应对危机升级的决心、勇气与能力。否则,南海问题将持续考验或挑战中国的大国地位。

有关国家的屡屡挑衅是对中国战略底线的试探,对底线的试探远远大于挑衅。所谓“温水煮青蛙”,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在南海面临的是持续的挑战和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如果中国应对挑衅不力,那么区域内国家将纷纷群起而效之,这样,力量对比更是进一步地向中国不利方向转变。应该看到的是,表面上,美国的卷入让南海争端风生水起,实际上美国在中东仍是无法脱身,或全身而退。更何况,中国是美国唯一有实力且有能力的潜在全球伙伴,中国手中有的是筹码,这是其它国家无法奢望的。中美可以通过谈判、妥协与合作来解

决问题。

如果越南、菲律宾敢于带头扛大旗挑战中国，势必进一步强化区域外强国围堵、遏制中国的意愿与决心，也势必进一步拉抬周边国家挑战中国的野心与能力。因此，要警惕在南海问题上产生不利于中国的转向，在战略上主动应对，有所作为。

(汤摘自《南风窗》2011 年第 25 期 储昭根 / 文)

经济

只有升级发展思维， 才能赢得中国经济新空间

章玉贵在《上海证券报》2011 年 12 月 15 日刊文指出：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工作任务来看，无疑，五大任务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全面升级发展思维，采取切实措施打造以内生性增长为主动力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如果不能找到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的相关动力，不能有效调动各个层面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则今后五年乃至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红利与要素趋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既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结构调整与民生福祉，更要正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的事实，致力于破解制约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相关约束条件，切实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全面落实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

笔者曾说过，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因此，唯有有效经

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才有经济学意义和国家意义。

这些年来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不彻底，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相关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趋于停滞，已成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着重思考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政府理应切实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更好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我们冀望，在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政府既要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要切实把握自身转型的时间窗口，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地，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李摘)

从两桶油巨亏看垄断企业改革的紧迫性

周子勋在《中国经济时报》2011 年 11 月 28 日载文说，国家发改委 11 月 24 日披露数据显示，9 月份炼油行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约 4 亿元。不过炼油行业受全年原油价格整体高位运行影响，前 9 月净亏损 11.7 亿元。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此前，中石油与中石化的财报显示，前三季度炼油业务亏损分别达到了 415 亿元和 230.9 亿元，总计 645 亿元。但全行业亏损额仅是两大石油公司亏损额的 1.8%。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悬殊巨大的数据呢？石